



高校图书馆与博物馆共建特藏资源与服务模式研究

□孔令芳* 韩子静

摘要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合作实践为例,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两馆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和服务模式,并总结了这一模式的合作基础、积极意义,进一步提出该模式的实施策略,以期为其他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工作提供新思路,并为中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LAM 高校图书馆 高校博物馆 特藏资源 合作模式 服务创新

分类号 G259 G269.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3.011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 LAM)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主要的三个文化机构,共同发挥着文化存储、信息传递和社会教育的功能^[1]。对于上述机构的馆际合作这一主题的研究,国外始于20世纪末,历年来研究热度不减,自2002年之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共有11次大会讨论和分享了LAM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经验^[2]。国内学者从2003年起围绕馆际合作的历史渊源、必要性、可行性模式、数字资源整合等领域展开了系列研究。刘家真最早关注LAM协作关系,提出应发挥数字图书馆的作用,建议特别考虑对LAM文化资源的融合^[3];肖永英和谢欣运用文献调查法对文化机构的合作机制进行总结,提出了文化机构可开展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的优势、挑战和趋势^[4];朱学芳总结了国外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服务融合的认识和实践,分析LAM融合管理机制,并立足国情对我国LAM合作模式提出建议^[5];王巧玲总结了美国林肯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在融合服务创新实践方面的经验^[6];罗红等分析了LAM馆藏特征的异同,通过剖析基于LAM协作的图书馆馆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LAM协作背景下图书馆馆藏发展策略^[7];莫振轩在介绍国内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馆际合作的部分实践项目基础上,对我国LAM合作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我国LAM合作的发展策略^[8]。然而,浏览

国内的研究,以对国外成功案例的介绍居多,国内除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实践探索之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和推广方面的合作案例几乎未见诸笔端。

特色馆藏资源是指图书馆根据特定主题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体系或者规模的专门收藏^[9]。这些文献资源通常具有系统性、珍贵性和独特性,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素材,是体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水平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支撑学校形成文化竞争力、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资源^[10-11]。近年来,国内外高校图书馆越来越重视特藏资源的建设工作,形成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特色馆藏。笔者曾对世界排名前10位的高校图书馆进行调研,发现10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在特藏资源建设工作上均成效显著,且在制定图书馆未来规划和馆藏发展策略时都明确强调要进一步着力建设特藏资源^[12]。另有学者调研了国内13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60所有代表性的地方院校图书馆,结果显示两者都注重特藏资源的建设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特藏服务^[9]。随着特藏的日渐丰富,如何充分发挥这些独特资源的价值、妥善处理“藏与用”的关系,已成为摆在图书馆面前的重要课题。综合各项研究结果,让特藏“活起来”的常见方法除了提供在馆阅览服务和特藏数字化建设外,还包括策划展览、多媒体宣传、联合

* 通讯作者:孔令芳,ORCID: 0000-0001-8521-8268,邮箱:lfkong@zju.edu.cn。



专家举办讲座或研讨会、出版特藏主题目录等^{[10-11][13-17]}。但国内有关高校博物馆和图书馆之间开展特藏资源合作共建和服务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介绍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艺术与考古特藏资源建设方面的合作经验,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和服务模式,并总结了这一模式的合作基础、积极意义和实施要点,以期为其他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并为中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1 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合作共建的基础

1.1 相似的职能

《公共图书馆概论》一书中提到:“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上互相联系、互相融合^[18]。”这是历史上关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关系最明确的表述^[19]。虽然图书馆和博物馆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馆藏特征和服务方式,图书馆侧重于信息的组织,博物馆侧重基于信息的智慧传达,但是,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具有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责任。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而高校博物馆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两者是学生人格和智力发展的重要课堂。它们除了致力于保存文明、传播知识、促进学术进步外,还有另外一个职责,即启发和陶冶青年人的创造力、观察力、好奇心和同情心。因此,相似的服务职能使高校图书馆和高校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成为必然。

1.2 机构和政策的支持

合作意味着跨界,要在不同的隶属关系及管理条块中开展合作,不同机构之间的行政体系、资金预算途径、管理模式契合与否成为根本性的问题^[5]。在国外,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在国家层面组建了专门的机构推动 LAM 合作,主要在战略规划、资金保障等方面进行协同^[7]。在国内,图书馆隶属于文化部,博物馆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辖,档案馆的主管机关则是国家档案局,三者互不隶属,遵循各自的管理体系,并在各自领域有序运转,这种管理体制有利于加强本机构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但在客观上阻碍了各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1]。由于缺乏国家层面专门机构的协调和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 LAM 的跨界合作发展^[4]。但是,校园范

围内的合作模式具有显著的优势。在高校内部,摆脱了行政体制上的约束,同属于机构内部的直属单位,合作将更为顺畅^[20]。一方面,在学校的统筹部署下,三馆可以朝着共同的目标,从自身职能出发制定符合学校发展方向的馆藏发展政策。另一方面,机构之间的人员沟通交流更加便捷,遇到问题可以寻求内部解决的方式,避免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1.3 馆藏发展的需要

尽管数字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对特殊专业领域的知识获取依然需要依赖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各文化机构如果以共享馆藏资源的方式开展合作,就能积极促进馆藏的建设与发展^[21]。博物馆离开了藏品,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除了器物之外,文献也是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图书馆则在文献组织工作中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合作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图书馆希望建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奇”的特藏资源^[9],打造图书馆独特的品牌,需要与专业领域学者通力合作。综合而言,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的资源合作共建,达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效果,开辟了新的特藏资源建设路径。

2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合作共建的实践

2.1 两馆基本概况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浙江大学直属单位,归口于艺术与考古学院管理。该馆于 2009 年开始筹建,经过十数载的建设,于 2019 年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博物馆第一层包括展厅、藏品库房、修复展示室、学术报告厅和教育活动区等。学术区位于第二、三层,含方闻图书馆和专业教室,主要面向浙江大学师生和专业研究人员。该馆的首要使命是支持、提升教学与研究;并通过艺术品原作的收藏、教学、研究与展览,通过与不同学科师生的合作,致力于提高师生的美学素养、视觉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其收藏、展览与教育项目,皆与社会公众分享^[22]。

浙江大学图书馆是我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图书馆之一,其使命是以学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需求为导向,向不同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既满足当下又遥瞻未来的文献信息资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杭州拥有七大馆舍,其中,方闻图书馆于 2021 年 7 月



试开馆,该分馆重点收藏艺术与考古学科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主要以图书馆近10年积累的艺术与考古特藏为主,目前已经收藏的文献超过10万册。这些文献既有条件地开放给师生阅览,又是博物馆的展品。在国外,高校博物馆中设立图书馆并不少见,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中,例如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内就有一个专题图书馆,吸引了全世界研究英国艺术的专家到博物馆开展研究。

2.2 艺术与考古特藏的建设

尽管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方闻图书馆看似都很年轻,实际上基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发展的需要,两馆的合作共建由来已久。特藏资源的建设需要与本校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紧密联系,但不能仅着眼于满足当前的需求,而更应放眼于学科未来的发展要求。全面而独特的特藏资源能为学者发现研究线索、产生新知识、提出新课题提供可能^[11]。因此,图书馆需要前瞻性地规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走在前头。在博物馆和方闻图书馆建设目标确立之后,经过与博物馆方面专家的积极沟通,浙江大学图书馆于2011年启动了《艺术与考古大型特藏前瞻性建设规划》,与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收藏目标一致,明确今后要有计划地收集涵盖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艺术与考古范畴的图书、考古报告、图录、手稿、拓本、档案等。2020年图书馆重新修订形成了新的《艺术与考古特藏建设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对标国内外一流高校艺术与考古学科馆藏,对学科核心书目进行补缺采购,为博物馆的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的文献资源^[23]。

10年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博物馆专家的精指导下,图书馆积极探索艺术与考古特藏建设策略,在引进学术大家的私人藏书上与博物馆重点合作,以博物馆专家为主进行海外寻访、藏书评估、引荐权威专家给出专业意见,再由图书馆进行系统评估、价格谈判,并委托国内外专业书商有计划采购、验收和典藏。截止到2021年底,浙江大学图书馆已从海外引进了16套艺术与考古私人藏书,累计近6万册文献资料,逐步构建了完整的艺术与考古学科藏书体系。

这些私人藏书兼具系统性、珍贵性和学术性,为浙江大学乃至世界范围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全面而独特的参考资料来源。

(1)系统性。从内容来看,16套私人藏书内容

已覆盖古代全部地域、不同时期的研究,包括:亚洲艺术与考古、近东与埃及艺术与考古、西方艺术与考古(含古代、中世纪、拜占庭、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近现代与当代不同时期)等,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支持。同时,针对亚洲文明领域的珍贵文献资料的收集,目前已覆盖东亚、西亚、中亚、南亚与东南亚所有地域,将有助于亚洲文明的教学、研究、展览乃至智库建设。其次,藏书家本人也是研究领域的学术专家,因此私人藏书不是简单的册数累加,而是有机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物质呈现^[24]。以远东文化史研究专题特藏为例,整套藏书自成体系,体现了16世纪以来西方认识远东的基本方式,有助于研究中西交流史、东亚—西方交流史。

(2)珍贵性。特藏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除了文献价值外,还兼具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如其中法老时代埃及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中有1册1820年出版的《埃及与努比亚的金字塔、神庙与发掘遗址的探查与最新发现》,此书记录的壁画、器物与建筑皆彩色手绘而成,美轮美奂,是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最早出版的埃及艺术与考古研究著作之一,著作本身已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除了图书外,私人藏书中还汇聚了一批早期的考古报告、展览图录、拍卖目录等,极具研究价值。如《西北考古报告》涵盖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我国西北考古90%以上的成果,包括:斯坦因全部14种著作中的13种、威尔纳30年代在敦煌的调查报告、勒·考克的新疆考古报告等35种图书,这些图书皆为初版,无后来的复刻本,曾在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中作为珍本书陈展于展厅。

(3)学术性。在引进丝绸之路专题特藏时,来自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资深教授在给浙江大学图书馆出具的评估意见(内部资料)中表示“这批藏书包含了众多俄语的考古挖掘报告和同样丰富的关于阿富汗考古的书籍,对于了解中亚的丰富文明极其重要。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出类拔萃的研究资料”。在引进远东文化史研究专题特藏时,来自日本丸善株式会社的珍本部专家认为“该收藏覆盖了16—20世纪关于远东研究的所有领域。其中许多为珍罕本,今天已很难找见了。未来若想再发现类似的收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远东研究图书馆。这将是全球最好的之一”。事实上每一批私人藏书的引



进都征询了世界范围内权威学者的意见,只有极具学术价值的藏书才能被纳入馆藏。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会在日常采购工作中积极征询专家的意见,注重艺术与考古领域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的信息收集、整理和相关图书的补充订购工作;留意学科领域内大型文献的出版动态,在与专家充分沟通以及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强化特藏建设,采购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大型文献,如《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另外,经博物馆专家的牵线搭桥和图书馆馆员的积极联络,图书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众多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捐赠的珍贵文献,如美国盖蒂研究所赠艺术类专题图书、韩国学者赠韩国美术史图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赠考古期刊、顾祥虞赠博物馆中国展览图录等,这些文献极大地丰富了艺术与考古特藏资源^[23]。多种途径的合作共建,拓宽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藏书体系的广度,加深了收藏的深度,使其成为全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人类文明藏书之一。

2.3 艺术与考古特藏的融合服务

随着艺术与考古特藏资源的日渐丰富,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意识到要避免其处于“藏而不用”的状态,资源推广与利用和特藏建设工作同等重要。因此,两馆在资源共享与协同服务上积极开展合作,在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挖掘资源价值,探索学科资源创新服务,提升师生及公众人文素养及多元文化意识,推动世界文明互鉴和文化遗产创新。

2.3.1 服务教学科研

将特藏嵌入专业课程,是深入挖掘特藏价值、架设资源与用户之间桥梁的有效途径^[11]。在学院教师开设以特藏文献研究为基础的课程时,图书馆和博物馆主动配合教学活动,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协助学院教师将特藏文献真正融入其教学科研的核心工作中^[13]。例如,为了配合通识课程“文艺复兴艺术史导论”,图书馆协助授课教师梳理出主题相关书目,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代建筑与艺术史专题”特藏文献;为了配合该课程及“全球化文艺复兴:早期现代艺术史与跨文化交流高级研讨班”的课程教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共同举办“想象之境:十八世纪欧洲壮游的视觉文化”版画展,

集中展出的50余幅18世纪版画原作及复制品均来自上述专题特藏。通过授课教师主导、两馆馆员配合佐以文化展览的方式,学生对早期欧洲艺术所产生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23]。

2.3.2 合办展览讲座

通过展览向公众展示馆藏,实现宣教职能,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也是近年来图书馆用以推广特藏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前期特藏共建的基础上,已不定期合作举办了多个不同主题的文化展览,让特藏资源真正“走出去”。

除上文提到的版画展外,2015年,两馆利用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图书特藏,与“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了“从敦煌到犁鞞——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展线由近百年来丝路沿线重要绿洲城市的发掘报告与相关研究成果构成,通过171种珍本图书的展示,向公众开展了一次关于丝路历史与文明的教育。

2016年,两馆与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联合策划并举办“我来自东:东亚艺术收藏在西方的建立(1842—1930)”学术文献专题展览,展览涵盖了从1842年至20世纪中期西方关于东方艺术研究的重要著作和展览拍卖图录,反映了19—20世纪以来东亚收藏在西方建立的历史,以及东亚收藏在理念上的转变,并同时配套出版了同名展览图录^[25]。

2019年,为庆祝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而举办的两个展览“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和“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部分展览内容来源于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涉及13种83册图书。展览反响热烈,有近12.5万人入馆观展。

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承办的“天府千华——中国与亚洲”展览开展,展览分“中国古籍”和“外国珍本”两条主线,其中外国珍本包含99种254册图书,全部来自于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展览意在使非相关专业师生乃至普通大众通过观展对古籍版本、典籍文化有所了解 and 认识,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目的。

除此之外,两馆充分发挥各自拥有的学术空间的优势,联合开展了“艺术史系列讲座”,邀请学院专家学者或者由博物馆专家主讲,结合文献导读、小



型文化展览等活动,让听众深切感受世界文明的多彩魅力。

无论是展览、讲座、多媒体宣传,都是特藏资源利用与推广的有效手段。这些文化活动促成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深度合作,令两馆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3 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作共建对特藏建设的意义

3.1 保障特藏建设的质量

在各自独立的状态下,图书馆和博物馆缺少良好的信息交流,可能会导致部分文献资源的遗漏或重复建设的问题^[26]。合作将有助于两馆增进了解、相互学习,分享各自拥有的信息,了解未来发展的需求,减少馆藏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使两馆的馆藏得到更好维护和发展;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工作离不开学科专家的专业指导,博物馆专家的加入,保障了特藏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提升了资源协同采选的质量,拓宽了图书馆资源获取的路径,也为服务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使两馆能够更好地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职能。

3.2 提升特藏服务的水平

文化机构的合作能够提高特藏资源服务的质量^[4]。我国高校图书馆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辅助教学的使命,以开拓学生视野为己任,积极主动与校园文化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专业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培养其兴趣和加深其理解。高校博物馆除了具有公共博物馆的共性,即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之外,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作为隶属于高校的机构,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服务教学、服务科研的功能,其拥有的丰富馆藏为科研提供了研究保障,对促进高校科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最重要的馆藏是拥有超过7000件的包豪斯藏品,中国美术学院的包豪斯研究院立足于这些藏品,聚集了全世界的包豪斯研究学者,并编辑出版《包豪斯研究》年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现代设计艺术研究中心之一^[27]。因此,结合两馆辅助和服务教学的优势,可以使特藏资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课堂教学和研究中。此外,从办展水平角度看,博物馆在陈列设计、内容组织和对观众的把控上更为专业,将有助于深挖特藏资源的真正价值,提升特藏资源的利用率,并极大地提高两馆文献信息服务的水平。

3.3 扩大特藏资源的受众面

高校图书馆办展通常在馆内空间举办,一来场地有限,展览规模一般不会很大,展出内容受限;二来观展人员基本限于本校师生,至多推广到个别院系或团体,其影响力比较有限。而高校博物馆除了为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领域提供文化服务外,更肩负着与公共博物馆相同的社会教育职责。高校博物馆的服务已经超越了大学围墙,正逐步成为社区、城市、国家的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如牛津大学的7所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53万人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学校园外的普通公众,这些博物馆已经成为大学所在地区及附近城市的主要文化教育机构^[26]。因此,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联合办展能够扩大特藏资源的受众面,有力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3.4 争取外部资金的支持

世界各国的文化机构合作项目都面临着资金不足的挑战,文化机构应当联合起来寻求各方的支持,以获得充足的资金资助^[28]。在艺术与考古特藏建设过程中,耗资巨大,尽管图书馆克服困难,每年设立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专项建设经费用以支持,但是部分引进费用高昂、图书馆无力承担的专题特藏在引进时需要联合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艺术与考古学院共同向学校申请特别经费支持,如远东文化史研究专题特藏的引进就是成功的范例。此外,在采购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时还共同寻求到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项经费支持。

4 基于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探讨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特藏资源建设和服务推广方面的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支

4.1 立足国情校情,谋求合作机遇

鉴于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无法轻易改变,在现行条件下立足我国国情,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途径,争取最大范围的支持,打通机制阻碍,才是开展LAM创新实践的有效路径。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大繁荣,高校博物馆的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总量已近450家,并有更多学校在新



建、改建或扩建场馆,甚至是打造集群^[29]。高校图书馆则一直都是高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中心。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一般都属于学校直属机构,统一受学校管理,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鸿沟。因此在高校开展机构内两馆合作模式的基本实施条件已经成熟。

4.2 国家战略引领,高校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要求。大学既是知识传授和教学机构,又是文化机构,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应尤为注重文化建设。以浙江大学为例,早在2009年便紧跟时代发展要求,结合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提出要推动艺术与考古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目标。并在2020年启动“创新2030计划”首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项目——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正是在学校的战略指引、统一部署和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才得以建成,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相关工作才能有效推进,艺术与考古特藏才能有此规模。因此,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当紧跟国家和学校的战略发展步伐,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制定各自的馆藏发展政策,推进协同服务的整体性,使资源建设目标得以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4.3 运用先进技术,实现数字共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逐步成为当前国家信息资源建设的中坚环节,支撑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同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30]。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LAM合作最先涉足的领域便是数字信息资源的合作。目前国外成功的LAM合作案例有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 WDL)、欧盟数字资源整合系统(Europeana)、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学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支持的众多LAM合作项目等。国内的相关合作项目包括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国家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等^[21]。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整合有利于资源的长期保存,也能提升资源的服务能力。因此在两馆合作基础上实现特藏资源数字化服务也是接下来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需要重点推进的课题。

4.4 提前筹谋布局,培养多面人才

数字时代,图书馆馆员和博物馆馆员的角色已

呈现多元化趋势。尽管其职责各不相同,但也有共通点:(1)应具有对信息情报的敏感性,能够对信息资源进行筛选、挖掘和分析;(2)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利用最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3)应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特藏共建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如何协调好各方协同共建极其考验馆员的能力。可以说,两馆合作对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两馆在人才布局上提前筹谋,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

4.5 以用户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

资源与服务之间是相生相伴、互为依赖的关系,资源建设的水平决定了服务的水平,服务融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资源建设的深度和两馆协作的效果。因此,图书馆与博物馆在特藏建设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后续资源的服务方式,同步进行资源的研究、揭示和宣传,从“我能提供什么”转变为“用户需要什么”,真正做到契合用户的实际需求,面向不同类型的读者提供立体化、全方位的特藏服务,建立健全学科服务体系。融入教学、文献导读、专家讲座、联合办展、共建专题数据库等都是现阶段特藏服务的重要方式,但仍需要不断创新。现阶段,不少文献展览中,文献被直接作为展示对象陈列于展厅,但由于观众在字体识别、知识背景等方面差异性较大,使得一部分人对文献的理解存在障碍。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一场优质的文献展览要在信息重构的基础上实现二次转化和表达,应大量借助各类型的辅助展品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例如人工智能、数字导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构建资源展示与利用虚拟环境,提供图书馆与博物馆资源的多维服务与交互服务^[31]。

4.6 联合多方力量,争取资金支持

实践证明,特藏资源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保障。高校图书馆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拨款,不仅来源单一,而且有限的经费无法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联合多方力量,争取更多途径的资金支持是目前国内外图书馆都在努力尝试的方向。向学校争取专项经费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学校需要统筹全校事务,未必都能予以支持;两馆应积极拓展社会资金资助渠道,通过社会力量尤其是对母校有情怀的校友和机构,以实物捐赠、经费赞助等方式支持特藏建设工作。



5 结论

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承担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基于两馆合作开展资源共建工作顺理成章。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特藏建设和服务方面的创新模式和经验,将会为推进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和 LAM 相关实践探索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常大伟,刘菁菁. LAM(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协同服务的“碎片化”困境及其治理策略[J]. 山西档案,2021(1):21-26,39.
- 王海荣,李娟娟.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合作研究进展分析——基于 IFLA 会议主题及我国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分析[J]. 现代情报,2016,36(8):137-142,150.
- 刘家真. 我国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资源整合初探[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3):36-38.
- 肖永英,谢欣.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合作机制研究进展[J]. 图书馆杂志,2015,34(1):29-35,48.
- 朱学芳. 立足国情的图书、博物、档案数字化服务融合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11):1-7,52.
- 王巧玲. 美国林肯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融合服务创新实践及借鉴意义[J]. 档案学研究,2020(1):126-130.
- 罗红,罗小臣,陈京莲,等. 基于 LAM(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协作的图书馆馆藏发展研究[J]. 图书馆工作,2017,61(23):58-66.
- 莫振轩. 我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际合作的现状与发展策略[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8):8-12.
- 蓝紫琪,刘欣. 高校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与服务调查分析——“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院校图书馆的差异比较[J]. 图书馆界,2020(2):59-66,72.
- 宋敏. 基于微信平台的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推广[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2):37-40.
- 王乐. 略论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价值与发展方向[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3):12-17.
- 孔令芳,田稷,韩子静,等.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趋势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21,40(6):49-57.
- 阎琳. 国外 3 所世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服务与启示[J]. 图书馆工作,2019,63(18):131-136.
- 王虹.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现状调查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9(24):43-50.
- 刘洋. 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研究[J]. 图书

- 馆,2021(2):22-28.
- 魏清华,孙林,胡文静. 高校图书馆特藏文献数字化建设研究——以 CASHL 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1):81-86.
- 张毅,李欣. 面向数字人文的特藏资源揭示研究——以方志数据库建设为例[J]. 图书馆,2019(6):100-105.
- 汪东波. 公共图书馆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7.
- 张志清. 在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的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6):4-13.
- 张卫东.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 LAM 合作模式研究[J]. 图书馆工作,2016,60(12):14-21.
- Raab C M, Roth E J. Documenting New Paltz history: a case study in library-museum cooperation[J].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2001, 8(2):103-112.
-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EB/OL]. [2021-08-20]. <https://zjumaa.zju.edu.cn/about-us>.
- 韩子静,孔令芳,孟琼. 高校图书馆文科特藏建设与服务实践探索——以浙江大学图书馆艺术与考古特藏为例[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10):70-76.
- 田稷,孙晓菲,韩子静.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3):18-23.
- 王坤,缪哲. 我来自东:东亚艺术收藏在西方的建立(1842-1930)[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王红. 浅析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馆际合作及实现[J]. 图书馆情报工作,2011(S1):352-353.
- 耿超,刘迪,陆青松,等. 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
- Melrose E A. The North Yorkshire Unnetie Digitisation Project: from an idea to an opportunity[J]. New Library World, 2004, 105(1200/1201):196-202.
- 中国青年网. 高校博物馆的路怎么走[EB/OL]. [2021-08-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901210688693175&wfr=spider&for=pc>.
- 周林兴,周振国. 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J]. 档案管理,2014(5):10-14.
- 周婧景,马梦媛. 器物展览与文献展览比较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6):11-23,107.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27

收稿日期:2021年8月22日

修回日期:2022年1月19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Mode of Special Collection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of Library and Museum

Kong Lingfang Han Zijing

Abstract: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y museums in China. Taking the cooperative practic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s the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ode of constructing and serving special collection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of library and museum. It summarizes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is model,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LAM in China.

Keywords: LAM;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Museum; Special Collections; Cooperation Mode; Service Innovation